

新疆土陶与中华文化共同性：基于生存、情感与价值的三维分析

古丽孜巴·艾则孜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3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3日

摘要

新疆土陶技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不仅是地域性物质生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在日常器物中的生动投射。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从生存共同性、情感共同性、价值共同性三重维度，揭示新疆土陶技艺所蕴含的实用智慧、情感记忆与价值追求。研究发现，土陶的器用功能反映各民族趋同的生存逻辑，器物记忆凝聚共通的乡土情感，制作伦理传承“天人合一”与“精益求精”的中华价值基因。三重维度交织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日常根基，为传统非遗视域下阐释中华造物文化共性提供鲜活的微观实证。

关键词

土陶技艺，中华文化共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造物文化

The Common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Reflected in Xinjiang Earthenware Craft: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Based on Subsistence, Emotion and Value

Guliziba·Aizezi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1, 2026; accepted: October 1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As a carrier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Xinjiang earthenware craft represents not only the

文章引用：古丽孜巴·艾则孜. 新疆土陶与中华文化共同性：基于生存、情感与价值的三维分析[J]. 国学, 2026, 14(5): 1349-1354. DOI: 10.12677/cnc.2026.145189

achievement of regional material production, but also a vivid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comm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bodied in everyday artifacts. Adopting the literature-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wisdom, emotional memory and value pursuit embedded in Xinjiang earthenware craft from three dimensions: subsistence-oriented commonality, emotional commonality and value-oriented commonalit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functional application of earthenware mirrors the convergent subsistence logic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memories embodied in artifacts consolidate shared native sentiments; and production ethics inherits Chinese cultural genes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These three interwoven dimensions testify to the everyday foundation of the pluralistic-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vide vivid micro-empirical evidence for interpreting the commonality of Chinese material-making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Earthenware Craftsmanship, Common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Creation 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疆土陶技艺主要分布在喀什、和田等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 2008 年，新疆土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土陶作为丝绸之路的活态遗产，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见证，也是承载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的瑰宝。目前现有研究多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工艺角度，探讨土陶的花纹、色彩、造型等艺术特征；二是从考古学角度，关注土陶的缘起和文化交流；三是非遗保护角度，分析非遗传承的困境和应对措施；四文旅融合角度，探索土陶的文创设计与当代转化。这些研究为新疆土陶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虽然有研究中指出新疆土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陶瓷存在一定“共同性”[1]，但学界缺少深入分析。虽然也有学者曾从“情感物化”的角度为切入点研究[2]，但整体而言，目前存在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土陶技艺背后所存在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其中可能存在的、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中华文化共同性要素。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土陶技艺中是否存在超越地域与民族的中华文化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如何体现？

2. 生存共同性：土陶的实用功能与生存智慧

2.1. 功能普适性

从文化功能视角来看，任何器物文化的首要功能都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而土陶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器物，其主要功能是盛水、储粮、和面等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正如技术人类学家普法夫指出的，不同族群面对相近的生存约束时，会自发形成高度相似的造物解决方案[3]，这一论断为解读中华大地陶器功能的共通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西域与中原土陶的功能体系呈现高度一致性。从功能角度而言，土陶在各民族的传统生活中都具有实用价值。新疆不同地域的土陶围绕日常需求形成差异化品类布局根据研究记载，吐鲁番地区土陶器以各种造型的壶见长。而喀什地区土陶以罐、壶、盘、碗、缸、盆、灯等 70 多种生活用品最为突出，其中用于洗手的“阿卜都壶”就是喀什土陶的代表作。考古学家张光直(1986)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

也表明,史前中国各地文化虽各有特色,但在器物功能、技术特征等方面存在共同的文化底色[4]。对照中原考古遗存可见,仰韶、二里头等文化陶器同样以储水、存粮、炊事为核心用途,西域与中原陶器功能高度重合,正是中华文明统一造物底色的实物佐证。制作者的核心关切也是体现这种共同性。

除器物外部功能趋同外,各族匠人底层造物初心的一致,进一步夯实生存维度的文化共性。无论西域还是中原,制陶匠人皆将器物的实用耐用作为制作的首要准则。中原历代制陶匠人同样以器物实用耐用为第一标准,二者共享“器物服务于人、好用为本”的核心职业追求。这种扎根日常生活需求、以实用为第一导向的造物共识,是各民族共通生存逻辑在手工技艺中的直接显现,也为下文制陶技术层面的同源交融埋下铺垫。

2.2. 技术同源

前文论证了西域与中原土陶在日用功能层面高度趋同,而相似的生存造物需求,必然催生趋同的制陶技术选择。新疆土陶与中原陶器在材质选择、器型设计、烧制工艺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同构性特征。考古发现表明,这种技术同构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彩陶艺术从黄河流域向西传播,沿天山向西流布,深刻影响了西域文化的面貌[5]。跨地域的技艺传播、各民族工艺相互整合,正是中华文化生存共同性的深层技术载体。

首先是原料材质选取逻辑一致,两地匠人皆遵循因地制宜取用本土黏土的选材准则。维吾尔族制陶多采用红黏土,经过选料、揉泥、陈腐等工序后使用[1]。喀什地区的制陶人使用的“色格孜”土,取自吐曼河畔,质地细腻、粘度适中[2]。而中原的仰韶文化陶器则多采用当地的红土和黑土,二里头文化陶器选用的则是黄河沿岸沉积的黏土,而这些原材料都要经过选料、淘洗、陈腐等工序足以印证中华制陶“就地取材、精细炼泥”的共通传统。

其次,器型设计承袭统一范式,同时形成地域化融合特征。如前文功能普适性所说,吐鲁番的土陶造型壶见长,而喀什地区则是以生活器具为主。这就与中原地区的碗、壶、盘等日用陶器基本可以对应,可以反映出中原与新疆相似的器用需求。杨超(2026)指出,南疆地区轮制陶的器型上保留着汉代陶豆、唐代执壶等汉唐中原器型的基因,也有模仿中亚金属器的器型[6]。由此可见,新疆土陶以中原制陶范式为根基,融合外来艺术元素、扎根西域本土环境,形成多元一体的工艺体系,直观印证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

最后,烧制工艺承袭中原早期低温制陶传统。新疆土陶采用草木烧窑,以低温烧成工艺为主。据王涛(2013)记载,新疆土陶的烧成温度在 900℃ 左右,烧成时间一般不超过十个小时[1]。这种低温烧成技术与中原早期陶器一脉相承,既体现出中原制陶技艺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历史轨迹,也反映出新疆地区在吸收借鉴中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原料与生产条件形成自身特色,是各民族在制陶工艺领域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黏土原料、器物造型到窑烧工序,新疆土陶与中原陶器形成完整的同构技术体系。技术层面的高度相似,不只是古代工艺跨地域传播交流的客观结果,更是中华大地各民族面对相同生存需求,自发形成统一造物技术路径的具象体现,为下文分析本土环境下的技术调适奠定基础。

2.3. 技术适应

在前文中原与西域相通的完整制陶技术链条之上,新疆匠人结合本地干旱少雨、昼夜温差悬殊的独特自然条件,对通用器物形制进行在地化改良,形成共性基础之上的地域特色设计。

最为典型的“带流”结构,在陶罐口前沿设置鸭嘴状的流槽,用于精准地控水、减少蒸发与洒漏,充分体现出新疆作为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管理的智慧。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储水陶器器壁较厚并且口

沿较小，充分利用陶土的微透气性来实现水的蒸发降温，起到了“冰箱”的保鲜效果，在传统生活中充当天然储水器具。

杨超在研究中进一步佐证了“同源改造”：图木舒克土陶的模制拍印技法虽源自中原，但器形更厚重、容积更大，以适应戈壁滩上的储水储粮需求[6]。这种设计并未脱离中原与西域共通的实用造物逻辑，反而是新疆在和中原同样的造物逻辑中对器物“储水功能”的优化，是生存共同性中技术适应的具体体现。这种“同中有异”的技术格局，也从日用器物微观层面，诠释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在特质。

3. 情感共同性：土陶的记忆承载与情感共振

3.1. 器物与身份认同

前文重点阐释了土陶满足民众生存需求的实用价值，而除却物质功用之外，土陶更是承载人类情感的物质载体。土陶承载着人们对“家”的情感，用陶罐腌菜想起故土，用“阿卜都壶”洗手时则想起祖辈的传统——这种情感联结的产生，不依赖于器物的精美程度，而依赖于它与人之间持续的身体接触与代际传递，这种对于“家”的眷恋，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具备天然的共通性。

从这个角度看，土陶所承载的情感认同具有跨民族共通性。无论是维吾尔族家庭里世代相传的陶壶，还是汉族家庭灶台旁的腌菜缸，这些器物都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家庭记忆的建构：它们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被人的手温、目光和习惯浸润，又在年复一年地传承中将前人的生活痕迹传递给后人。梁媛等(2024)在研究中指出，喀什土陶艺人在制陶过程中，将情绪、情感、经验和文化认知不断挖掘并与陶土粘合，让抽象的情感得以具象呈现，也让普通的陶泥被赋予情感温度[2]。总的来说，器物因此成为留存集体记忆的情感容器，它所承载的童年、家庭与故乡记忆拥有统一的情感逻辑，不存在民族层面的本质区别。

3.2. 礼俗互动中的情感投射

如果说家庭日常使用中的情感投射是私密的、个体化的，那么土陶在礼俗活动中的作用则展示了情感的集体化表达，那么在节庆、婚嫁等礼俗活动中，土陶被赋予超越实用功能的象征意义，成为集体情感的物质载体。在各类民俗仪式中，土陶脱离单纯的实用功能，被赋予丰富象征内涵，成为承载群体共同心绪的物质媒介。

各类土陶纹样、主题创作，承载着人们的感情与祝福。在新疆英吉沙县，土陶艺人在马年新创作的土陶中融入了马年元素，从而来表达“马年大吉，龙马精神，日子越过越红火”的美好祝愿[7]。土陶手艺人表示土陶纹样中的祥云、仙桃、牡丹、葡萄等图案，同样象征着“福禄寿喜”等各族群众共同喜爱的美好寓意[7]。这些符号说明无论哪个民族，他们在情感表达的底层逻辑具有共通性——无论哪个民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吉祥如意的期盼，在结构上是相似的。

中原婚嫁用来盛放喜物、寓意“早生贵子”的陶罐，与新疆假日活动中的生肖主题的土陶虽民俗场景各不相同，却都以器物为媒介，把内心抽象的祈愿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承的物质符号。杨晓薇(2022)指出，礼俗互动中蕴含的文化价值的共通性，一方面通过器物赋予情感以物质形态，另一方面又通过礼俗实践强化人们对共同价值的认同[8]。而土陶在此扮演的是“情感纽带”的角色，将各民族内心的情感外化成可共享的符号，并通过礼俗活动中的集体使用，将这些情感汇聚为跨个体的情感共识。

4. 价值共同性：土陶的生活哲学与文明基因

4.1. 工匠精神与制作伦理

土陶制作完整体现出中华民族共通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专注细节和创新的职业精神。而土陶的制作也离不开工匠精神，要求耐心细致、精益求精，这与不同民族的工匠群

体有高度一致性。

维吾尔族制作陶器的老人强调“做陶不能急”，在汉族民间有句工匠格言叫“慢工出细活”，二者内涵高度契合。而这种追求并非偶然的相似，是手工造物自带的实践逻辑：一件合格陶器的品质，离不开匠人对制作时长的敬畏、对每一道工序的坚守。

维吾尔族匠人与汉族匠人的相似表达，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套共通的工匠伦理不存在单向的文化输出，是相似手工生产模式催生的统一职业规范。无论是哪个民族还是哪种工艺，没有一个有工匠精神的手艺人会为了省事去赶工降低产品质量。这种跨民族的工匠伦理共识构成了价值共同性的第一重维度。

4.2. 道器合一与技术哲学

土陶技艺强调顺应土性、掌控火候，体现出中华传统造物观中“技进乎道”的思想——技术达到纯熟之境，便与道相通。维吾尔族土陶有“七十二道工序”的口传说，景德镇做瓷器也有句老话叫“过手七十二”，但老艺人嘴里的“七十二”并不是一个精确数，它更像是一种叮嘱：活儿要细，步骤不能省。一个在南疆地区，一个在赣北，相隔几千里，但是数字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种跨越地域的认知共识：优质器物必须经过繁复细致的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可简化。

这种对“工序完整性”的追求，正是中华工匠精神共有的价值内核，也是“道”在日用器物层面的具体呈现。这种“以器观人”“道器合一”的价值逻辑，同时适用于新疆土陶与中原各类陶瓷。它不是某一民族或地区的专属理念，而是中华大地上千百年手工劳动积淀下来的共同智慧。这正是土陶技艺价值共同性的深层体现：各民族匠人依托相通的从业准则与造物哲学，代代传递踏实深耕、用心成事的共同追求。

5. 结语

5.1. 结论

本研究从生存、情感、价值三个维度分析了新疆土陶技艺中的中华文化共同性。第一，生存层面是器物共性的物质根基。新疆土陶与中原陶器围绕储水、储粮、炊事等底层生存需求形成统一功能体系，原料、器型、低温烧制工艺沿丝绸之路同源传播；同时匠人结合干旱地域环境优化器型，形成“整体同源、局部调适”的器物特征，直观呈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物质底色。

第二，情感层面搭建跨民族精神纽带。日用陶器承载各族群众共通的家庭与乡土记忆；礼俗场景中，祥云、生肖、福禄寿喜等共享吉祥符号，折射出全体民众对美好生活一致的精神期盼，构建不分族群的情感共振通道。

第三，价值层面承载中华文明共通精神基因。“做陶不能急”与“慢工出细活”形成跨民族统一工匠伦理；南疆地区与景德镇“七十二道工序”的行业共识，共同诠释中华传统“道器合一、技进乎道”的造物哲学，是千百年手工文明沉淀的共有价值。

生存、情感、价值三层维度由物质表层递进至精神内核，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小小土陶以民间日常器物的形态，实证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为依托传统非遗阐释中华文化共同性提供鲜活微观样本。

5.2. 实践启示

从上述认识来看，对实践层面也有几点启发。

博物馆和非遗展陈展示叙事时，不应只讲“民族特色纹样”，也可以讲土陶如何服务于盛水、储粮、

和面等共同生活需求，让观众理解这些物品的日常用处，便于观众理解不同民族器物背后的共同生活逻辑。

传承人培养上，除了教授技法，也可以把“做陶不能急”“底要稳、口要圆”这类制作伦理和功能理性纳入教学内容，把制作伦理和功能理性一起教，将共通工匠精神、传统造物哲学融入技艺教学，塑造传承人的整体性中华文化认同。

第三，在文创的开发应用上，可以回归到大家的生活场景里去。围绕家庭日用、节庆礼俗等共有情感场景开发实用陶艺产品，让文化共同性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总而言之，土陶技艺所承载的文化共同性，是各民族传统生活与造物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体现，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日常器物层面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 [1] 王涛. 浅议新疆维吾尔土陶艺术研究[J]. 大众文艺, 2013(17): 94-95.
- [2] 梁媛, 张玲玲. 化土为器——喀什土陶文化生产中的情感物化与物的情感化[J]. 青海民族研究, 2024, 35(1): 190-196.
- [3] Pfaffenberger, B. (1992)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1**, 491-51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an.21.100192.002423>
- [4] 张光直. 古代中国考古学[M]. 印群,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 [5] 刘学堂. 丝路彩陶·天山卷[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22.
- [6] 杨超.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新疆喀什土陶基因提取与路径选择[J]. 美术研究, 2026(1): 117-121.
- [7] 央广网. 第十三届“天山南北贺新春——非遗民俗展‘暨英吉沙’非遗过大年”活动举办[EB/OL].
http://xj.cnr.cn/xjfw_1/tpxw/20260218/t20260218_527529826.shtml, 2026-02-18.
- [8] 杨晓薇. 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以白族“礼俗互动”为视角[J]. 民族学刊, 2022, 13(2): 11-18+134.